

## 孙楷第戏曲文献研究成就 \*

苗怀明

毫无疑问，在二十世纪戏曲研究史上，孙楷第是应该重重写上一笔的。他虽然出生较晚，不能像王国维、吴梅等人那样开疆拓土，创建戏曲研究这门新的学科，开一代学术之新风。但他以个人辛勤的耕耘和丰硕的成果，推动了戏曲研究向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，为这门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以下结合孙楷第的生平经历及著作，对其在戏曲研究领域的成就、治学特点等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归纳。

—

孙楷第能在小说、戏曲等通俗文学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，有着多方面的因素，这一方面与他多年甘于寂寞、埋首书斋、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有关，另一方面也与他所受到的教育、学术训练及前辈学人的热情帮助和提携有关。在探讨孙楷第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特色时，不能不谈到他的学术传承和治学渊源。

孙楷第在走上学术之旅的过程中，曾得到过傅增湘、杨树达、陈垣、胡适、钱玄同、黎锦熙等著名学者的亲传和提携<sup>①</sup>。这些学人功力深厚，学识渊博，为人为文，皆为楷模，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，他们言传身教，提携后进，对孙楷第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。1922年至1928年，孙楷第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求学，几年高等学府的紧张学习使他得到严格而良好的学术训练，因知识渊博，才识过人，学有所成，同学们戏称其为“沧州才子”<sup>②</sup>。在这一期间，他受乾嘉学派治学的影响较深，在经、史方面曾下过很大工夫，对校勘、训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由此打下扎实的学术功底，“开始掌握了清人训诂校勘之学的门路”<sup>③</sup>。其间，他曾撰写《王先慎〈韩非子集解〉补正》、《刘子新论》

\* 资金项目：国家“985工程”“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”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。

①有关孙楷第与胡适的交往情况，参见季维龙：《胡适与孙楷第的学术情谊》，载沈寂主编：《胡适研究》第一辑，东方出版社，1996年。

②参见刘乃和：《我所认识的孙楷第先生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91年第3期。

③孙楷第：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，载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17页。

校释》等文章，受到杨树达等人的赞赏。对这段求学经历，孙楷第本人后来是这样概述的：“及游学北平，始稍知读书。听钱玄同先生讲小学而悦之，乃稍稍从事于训诂声韵之学，质疑问难，得益不少。又尝读王氏父子书，服其精至，慕而效法其意，每读古书，辄以己意为发其疑滞，订其讹脱，于《韩非子》及刘昼《新论》各得数百条。”<sup>①</sup>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孙楷第此时的深厚学术功力：王重民后来到法国看到敦煌卷子本《刘子新论》，他将孙楷第的校勘本与其进行对照，结果“发现与唐抄本完全相合”<sup>②</sup>。

数年正规、系统的学术训练为孙楷第日后戏曲、小说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这种学术训练还潜在地影响到其研究对象及治学方法的选择。孙楷第一生治学，特别注意文献的搜集、整理和考辨，偏重实证式研究，这一学术个性的培养与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是互为因果的。

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受时代学术风尚的影响及编写《中国大辞典》、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等工作的需要，孙楷第开始从经史之学转向通俗文学研究。这种转向正如一位学人所概括的：“虽然带有某种偶然性（由于工作的需要），但从全局上看，他的这一转变却又正适应历史的需要，具体说来，是适应着我国学术界发生了以训诂、校勘之学用于俗文学这一转折的新潮流。”<sup>③</sup>时代的良好际遇与个人的不懈努力成就了一位优秀的学人。

孙楷第转向通俗文学之后，起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俗小说方面，短短几年间，他广泛搜寻珍贵典籍，利用公私藏书，搜集、积累了大量资料，先后写成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》、《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》、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等著作，以其在小说目录学上的开创性贡献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，并由此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。稍后，他又将目光转向戏曲，开始戏曲领域的探索，“于三十五岁时开始做戏曲研究工作，垂老不倦”<sup>④</sup>。

孙楷第晚年撰文，将自己平生治学成果分为五个方面，即小说史、戏曲史、变文、楚辞和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词<sup>⑤</sup>。限于论题，本文只探讨其戏曲研究方面的成就和特色。结合孙楷第在不同历史时期治学的成就和特点来看，可以将其戏曲研究分成如下两个阶段：

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为第一个阶段。在这一阶段里，孙楷第相继发表《傀儡戏考原》、《述也是园旧藏〈古今杂剧〉》、《吴昌龄与杂剧〈西游记〉》、《元曲家考略》等重要著述，在不少方面取得突破，推动了戏曲研

①孙楷第1929年致胡适书信，载杜春和、韩荣芳、耿来金编《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493页。

②孙楷第：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，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，第18页。

③邓绍基：《读孙楷第先生的学术论著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87年第2期。

④孙楷第：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，载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，第25页。

⑤参见孙楷第：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。

究的深入发展。此外,他还参加了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一书的编写,其中有不少戏曲条目是他所撰写的。孙楷第在戏曲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在这一阶段取得的。

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,这是孙楷第戏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。在这一阶段里,受政治运动及身体状况等因素的影响,他的学术著述数量不多,在戏曲研究上,没有再开拓新的领域,主要是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修订。比如将其有关傀儡戏的论文结集,成《傀儡戏考原》<sup>①</sup>一书。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<sup>②</sup>、《元曲家考略》<sup>③</sup>等著作也都是在以往著述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。其部分散篇戏曲论文被收进《沧州集》<sup>④</sup>。在其他学人的协助下,他晚年还着手编订当年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所撰写的戏曲、小说条目,成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》一书,但到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,孙楷第已去世数年,无法得见该书了。

与其他研究者相比,孙楷第研究戏曲具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个性和特点,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:

一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,他偏重对戏曲文献的梳理和考索。无论是对戏曲起源问题的辨析还是对元代曲家的考察,无论是研究《西厢记》还是探讨也是园《古今杂剧》,他都是首先从最基本的文献工作做起,充分占有资料,从版本、目录、训诂等角度着手,言必有据,结论建立在扎实文献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,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。比如对杂剧《西游记》作者的考辨,他大胆提出该剧的作者为杨景贤而非吴昌龄,这与学界以往的看法明显相左,可谓新说。但这种新并非标新立异之新,而是对旧有成说之谬进行纠正之新,有过硬的资料和充分的论证做支撑。因此,新说提出后很快就被学界接受,成为定论,正如孙楷第本人所说的:“我这话或者令人乍听了有点惊异。但令人惊异的话未必便不可信。到大家认为可信时,便平淡无奇了。”<sup>⑤</sup>

一是在具体研究中,他往往从小问题入手,做大文章,开口很小,但开掘很深。这一特点也可以用精细二字来概括。比如对傀儡戏、也是园《古今杂剧》的考察,他都不满足于泛泛的介绍,而是下大力气进行集中探讨,就是连一些细节问题都不轻易放过。《傀儡戏考原》、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两书就鲜明地体现了孙楷第的这一治学特点,对这一点他本人也有很清楚的认识,如他评论自己的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一书:“论一书而所记至二十万字,亦不可谓少。”<sup>⑥</sup>

①上杂出版社,1952年。

②上杂出版社,1953年。

③上杂出版社,1953年版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增订版。

④中华书局,1965年。

⑤孙楷第:《沧州集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366页。

⑥孙楷第: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后序,上杂出版社,1953年,第411页。

由此可见精细是其本人自觉追求的学术目标。对他的这一治学特色，著名学者余嘉锡曾作过这样的评价：“沧县孙君子书楷第，治之尤精。考镜源流以穷其变化，斟明体例以究其文词，毛举栉剔，细入无间，其用力之勤，与昔人之治经史诗赋者，殆无以异也。”<sup>①</sup>

## 二

根据孙楷第治学的成就和特点，这里将其戏曲研究分成两个方面来进行简要的介绍和探讨：一是对戏曲文献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；一是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对中国戏曲史诸问题进行的探讨。

在戏曲文献学领域，孙楷第主要做了如下两项较为重要的工作：

首先是戏曲目录的编制，其成果主要见于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》一书。孙楷第虽然未能像治通俗小说那样，广搜博采，遍访海内外公私藏书机构，着意专门编写一部系统、精良的戏曲目录著作，但他在戏曲目录的编制方面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且有自己的特色。这一工作虽然是为日本东方文化协会主持的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一书而进行，倒也符合孙楷第一贯的治学特点，可以较为充分地发挥其学术专长。孙楷第是从1934年12月开始动笔写作的，到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爆发，他便决然停笔，结束了这一工作<sup>②</sup>。据后来结集的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》一书所收，孙楷第总共写了273篇，内容涉及作品、总集、选本、曲谱、曲评、曲目等曲学书籍。

解题书目不同于一般的简目，它不仅提供书名、卷数、作者、版本等基本信息，同时还要对全书的内容进行评述，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订，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，颇能见出作者的学术功力。孙楷第所写这273篇戏曲解题目录正体现了这一特点，态度审慎，资料丰富，立论公允、精当，每一篇提要都可以称得上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。比如对王国维《曲录》一书的评价，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，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：“力惩前人之失，杂采《武林旧事》、《辍耕录》、《录鬼簿》、《太和正音谱》、《也是园书目》、《新传奇品》、《曲海目》、《元曲选》、《六十种曲》及所见所闻，无不备书，即作者仕履及前人评骘之语，亦必依类辑入。……纲举目张，有条不紊，足为后学准绳。”但同时也指出，由于《曲录》成书后新资料不断发现，该书存在的问题也日渐突出，如重出、失考、失收、误载等。最后他对该书做出如下评价：“此书可议处虽多，然大辂椎轮，创始不易，其精神固甚可佩也。”<sup>③</sup>应该说这一看法还是相当客观、公允的。

通过这两百七十多篇解题目录，孙楷第较为全面、系统地谈出了自己对中

①余嘉锡：《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序》，载其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，第584页。

②参见田彬：《孙楷第与〈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〉》，《文学遗产》，1991年第3期。

③孙楷第：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460页。

国戏曲诸问题的看法，其中不乏真知灼见。这种融学术研究于目录编制的方式在当时并不多见，有位台湾学者对此有着很高的评价：“这部大书（指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）总的来说是尚未编完的草稿，其中以孙楷第先生所写的部分最有创见，今天读来仍有其价值。”<sup>①</sup>应该说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妥帖的。戏曲之外，其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》、《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》也采用了这种著述形式。

其次是对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的考察。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又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，它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最为重要的戏曲文献新发现之一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。在现存的 242 种作品中，有 132 种为海内孤本，它们的发现使现存元明杂剧作品的数量大为增加，其他 100 多种作品虽有其他传本，但相互间文句差异较多，足资校勘，这一发现对戏曲研究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。这一重要戏曲文献被发现后，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，一些学者开始着手整理研究，其中用力最勤、成就最著者当数孙楷第。

1939 年 8 月，孙楷第从北京赶到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，用 3 个星期的时间阅读了这批重要戏曲文献，并写下了 10 余册笔记。其间，他还得到张元济的指教，“其疑似难明以及欲抄录而未果者，辄询之张菊生先生”<sup>②</sup>。回到北京后，孙楷第将读书所得，写成《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》一文，刊载于 1940 年 12 月出版的《北平图书馆季刊》。由于感觉到“体例文字，甚多不妥之处”<sup>③</sup>。1947 年夏，孙楷第又将此文加以修订，“去其重复语，累赘语。材料之有遗漏者，亦补完之”，并吸收了另一位学人李玄伯补充的一些材料<sup>④</sup>，撰成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一书，交上杂出版社于 1953 年出版<sup>⑤</sup>。

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一书分收藏、册籍、板本、校勘、编类和品题六章，对这批戏曲文献的“授受之源，一出一人，以及本之离析合并”等情况进行了十分精细的考察。书后还附有《余所见钱谦益重编义勇武安王集》、《也是园曲于也是园藏书目底本》等 5 篇相关的论文。作者态度审慎，引证丰富，立论扎实，同时又心细如发，对每一个细节问题都进行了穷究式的探讨，解决了这批重要戏曲文献的授受渊源、册籍装订、版本、校勘、品题等基本问题，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该书出版后，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。王季烈称其“考订甚详，足使此书增价”，并在其《孤本元明杂剧提要》中“略采其说，入提要中”<sup>⑥</sup>。余嘉锡感叹道：

①转引自田彬：《孙楷第与〈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〉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91 年第 3 期。

②孙楷第：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序。

③孙楷第：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改版本序。

④李玄伯：《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跋》，《辅仁学志》12 卷 1、2 期合刊（1943 年 12 月）。

⑤孙楷第：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改版本序，上杂出版社，1953 年。

⑥王季烈：《孤本元明杂剧》序，商务印书馆，1941 年。

“嘻，多矣哉！考一书而详密如此，古未尝有也。然读之使人惟恐其尽，盖察之也精，则说之也不得不详，亦其势然耳。”<sup>①</sup>容媛也称赞该书“非特于书之授受渊源，本之离析合并，毛举栉剔，阐发靡遗，即元剧中之专名，如折、楔子、开、砌末、竹马、路歧、书会、捷讥引戏，为今人所不易了解者，皆有详尽之叙论。仅观书名，固不能知此书之博大也”<sup>②</sup>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孙楷第本人对自己的这本书却并不太满意：“征引书不过一百六十余种，殊嫌其少。其所据以考旧事者，亦无多新义可以自矜。”<sup>③</sup>征引了一百六十多种书籍，可以称得上是旁征博引了，却作者仍嫌其少；解决了不少问题，尚觉得“无多新义”，可见孙楷第对自己要求之高、之严格，其治学态度和精神之认真、严谨，也由此可见。

该书可以看作是孙楷第借助版本、目录之学研究戏曲的一个范例。戏曲研究这门新兴学科在创建阶段虽然深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，但由于此前缺乏必要和足够的学术积累，因此研究者们必须从最为基础的文献工作做起。这样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传统的治学方法仍然起着重要乃至主导的作用。当然，这也与研究者本人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爱好有关。无论是戏曲研究初创时期的王国维、姚华，还是稍后的孙楷第、钱南扬、冯沅君、傅惜华等人，他们都比较偏重文献方面的研究，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，二十世纪上半期戏曲研究的主要成就和特色也正体现在这一方面。其中孙楷第的戏曲、小说研究颇具代表性，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一书正是这一学术风尚的具体体现。这种精细、穷尽式的考订对于戏曲文献的研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。

### 三

在对戏曲文献进行梳理、考辨的基础上，孙楷第还充分挖掘这些文献所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，将其纳入对中国戏曲史的探讨中。在这一领域，孙楷第也颇多建树，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，这些新见有些已为学界普遍接受，有些虽有不同意见，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和思路。

孙楷第对戏曲史的探讨，主要涉及如下一些方面：

一是对戏曲起源问题的研究。其观点主要见于《傀儡戏考原》一书，该书包括《傀儡戏考原》、《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影戏》、《傀儡戏影戏补载》等文章。在这些文章中，孙楷第对傀儡戏的起源、演变、体制及与宋元戏曲的关系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考察，提出戏曲起源于傀儡戏的新看法：“宋之戏文元之杂剧，即出于肉傀儡及大影戏”，并从现存元明剧本、近世扮戏之事中找到

①余嘉锡：《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序》，载其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第584页。

②容媛：《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》，《燕京学报》第29期（1941年6月）。

③孙楷第：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后序，上杂出版社。

根据，如“偈赞词之使用”、“说话口气之保留”、“自赞姓名”、“涂面”、“步法”等<sup>①</sup>。

此前，研究者对戏曲起源问题已提出不少看法，或认为戏曲起源于巫觋，或认为戏曲起源于歌舞、乐舞，或认为戏曲起源于俳优，或认为来源于印度，众说不一，虽然各有其依据，但都未能获得学界的一致认可。最早将傀儡戏引入中国戏曲起源研究的是王国维，他在《宋元戏曲考》一书中指出：“与戏剧更相近者，则为傀儡。……宋时此戏，实与戏剧同时发达，其以敷衍故事为主，且较胜于滑稽剧。此于戏剧之进步上，不能不注意者也。”<sup>②</sup>孙楷第受此启发，在王国维初步探讨的基础上，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梳理和考辨，在傀儡戏的研究上获得重要突破，为研究戏曲起源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参考。孙楷第的这一新说提出后，一些学人如马彦祥、常任侠等表示赞同，并在其著作中采纳此说<sup>③</sup>。

尽管直到目前为止，学界对戏曲起源于傀儡戏的说法还持有不同的意见<sup>④</sup>，但即便是持反对意见者，也不否认戏曲在形成过程中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傀儡戏的影响，两者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，正如周贻白所说的：“傀儡戏影戏与真人扮演的中国戏曲的关系，却不能完全否定。那便是以中国戏剧的全部进程而言，傀儡戏影戏。对于中国戏剧发展到现在的这类形式，其间多少也起过一些作用。”<sup>⑤</sup>对这一关系和作用的揭示正是由孙楷第完成的，他本人曾这样概述自己的这一研究：“自来学者对傀儡影戏无系统研究，自从我这两篇文章出来，始有专门论著。”<sup>⑥</sup>

一是对元代曲家生平的考察。有元一代，戏曲发展虽然达到成熟、繁盛，剧作众多，演出频繁，影响广泛，但那些为元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众多曲家却因地位不高、身份卑微等原因，事迹湮没不传。虽然钟嗣成专门撰写《录鬼簿》一书以补其缺憾，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，但失之简略，无法满足后世学人的研究需要。因此，研究元曲，自不能不对曲家的名号、籍贯、生平、交游、著述等基本情况进行考察，否则就无法做到知人论世，难以深入下去。但这种探讨的难度

①孙楷第：《沧州集》第276—305页。

②《王国维戏曲论文集》第27页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84年。

③参见马彦祥：《地方剧演技溯源》（载《马彦祥文集》戏曲论文卷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95年）、常任侠：《关于我国音乐舞蹈与戏剧起源的一考察》、《我国傀儡戏的发展与俑的关系》、《谈傀儡戏和皮影戏》（载其《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4年）等文章。

④参见任二北：《驳我国戏剧出于傀儡戏影戏说》，《戏剧论丛》1958年第1期；董每戡：《说“傀儡”》，载其《说剧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3年；周贻白：《中国戏剧与傀儡戏影戏》，载《周贻白戏剧论文选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。

⑤周贻白：《中国戏剧与傀儡戏影戏》，《周贻白戏剧论文选》第65页。

⑥孙楷第：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，载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，第26页。

也是可以想见的，相关资料十分缺乏，即使那些残存的资料也往往零散分布，或说法不一，让人莫衷一是。孙楷第知难而上，“以元曲家事迹多晦，勤读元人集、明初人集，与《元史》结合，著《元曲家考略》”<sup>①</sup>。

《元曲家考略》可以说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孙楷第从开始搜集材料到其去世，在这本书上前后花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，其间不断对该书进行补充修订，直到去世前都未能全部完成。起初，孙楷第是与胡适合作进行此项工作的。胡适于1936至1937年间曾写过《读曲小记》多篇，对关汉卿、严忠济、白无咎、刘时中等元代曲家的生平经历进行考辨。后来胡适因兴趣转移，事务繁忙，遂改由孙楷第一人独力承担。这可以从他1947年写给胡适的书信中看出来：“元曲作者，事变后我又续得了一点材料，都抄出了来，比事变前我每[们]共同搜集的多了一些。事变前我们搜集的多半是限于《四部丛刊》中元人集子的材料，事变后我所抄出的，是《四部丛刊》以外的元人集子的材料，虽然不算博，大致元人集子已十取七八。”<sup>②</sup>于此可见该书起初的撰写情况。

《元曲家考略》的主干部分最初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刊发于《燕京学报》第36、39期，稍后以《元曲家考略》为名由上杂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单行本。全书分甲、乙两稿，收录元代曲家48人。在后记中，孙楷第讲述了该书的写作经过：“其材料乃二十年前所搜集。稿二十余册，置敝箧中，为鼠啮者十之二。1949年夏，偶检得数册，稍整比之，得二十三人。1950年夏，又检数册整理之，得二十五人。又补文之不备者共若干条。去年，上杂出版社欲印余论戏曲之书，乃取前后所整理者并付之。目第一次辑者为甲稿，第二次辑者为乙稿。其余有稿而未整理者，尚三四十人。频年多病，已无力及此。倘他日健康恢复，仍愿自整理之。”<sup>③</sup>尽管身体状况不佳，但整理、修订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。1981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，补收了后来所增写的一些内容。增订本虽已出版，但修订、增补的工作仍在进行着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，后来增写的部分大部分未能公开刊行。

不过就已经完成的部分来看，成绩可以说是卓然可观。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的增订本为例，全书分甲稿、乙稿、丙稿、丁稿四个部分，对撖彦举、奥敦周卿、王元鼎等85位元代曲家的生平、著述等基本情况广为引录资料，并进行了认真的考辨。这些考辨建立在丰富文献的基础上，扎实、可信，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，填补了戏曲研究的一项空白，为元代戏曲研究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《元曲家考略》是元代戏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，可以看作是一部元

① 孙楷第：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，载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，第25页。

② 杜春和、韩荣芳、耿来金编：《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513页。

③ 孙楷第：《元曲家考略》后记。

代曲家的资料汇编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一是对元曲体制的探讨。这方面的探讨主要见于《元曲新考》一文。该文由一系列学术札记组成，对元曲的折、楔子、开场、砌末、脚色、书会等重要问题进行考察，这些问题有些是人们较为熟悉，但认识有误或不够全面、深入的，有些则是人们感到困惑、未能解决的，孙楷第依据丰富的资料，一一进行考辨，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，这些见解“有超出王静安、吴瞿安二先生所论之外者，兼对二先生所论有所补充”<sup>①</sup>。

比如元曲的分折问题，通常认为北曲一套为一折，孙楷第经过考察发现，“北曲所谓折应有三意：一以套曲言，所谓一折等于一章。一以科白言，所谓一折等于一场或一节。一以插入之歌舞乐曲乐曲言，所谓一折等于一遍”，由于“后世所刻剧本，但明标乐章之折，其科白之折以及插入之歌舞乐曲乐曲等折，皆不明白区划，一一标举”<sup>②</sup>，这一做法影响了后人对折的全面理解。

再比如他对元曲楔子的看法，也有新人耳目之处。他认为楔子设立目的在于“补套曲之不足，其用仅次于套曲”，而且“北曲杂剧楔子尚有用在第四折套曲后者”。这一看法与人们通常的见解有着较大差异，尤其是后者“知之者少，前人论曲，亦未尝有之”<sup>③</sup>，但都讲得有根有据，很有说服力。

#### 四

戏曲、小说之外，孙楷第在敦煌变文、楚辞、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词等领域也都有很深的造诣，成就不俗。以敦煌变文为例，他曾写有《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》、《读变文》、《敦煌写本〈张义潮变文〉跋》、《敦煌写本〈张淮深变文〉跋》等论文，受到胡适、向达、王重民等人的好评。

最后需要着重说明的是，就是这么一位在戏曲、小说研究中取得如此显著成就的学人，去世后竟“留下了比已刊著作还多的遗稿”<sup>④</sup>，而且这些遗稿大多至今都未能公开刊行。这里稍作介绍：

孙楷第曾有编撰一套《曲录新编》的宏大学术计划，其中元曲部分即《录鬼簿校注》已经完稿，“该书以明天一阁蓝格抄本《录鬼簿》为底本，用其他版本参校，所得异文一一作出校记，改正错讹十分精审，并有具体考证”，“朱墨

①孙楷第：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，载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，第26页。

②孙楷第：《沧州集》第319页。

③孙楷第：《沧州集》第323、325页。

④杨镰：《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》，载王瑶主编：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371页。

灿然，字迹工整，是一部工力深湛的古籍校勘”<sup>①</sup>。可惜直到目前为止，该书仍未见公开刊行。

孙楷第曾于1934年至1939年间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阅读明清剧本近千种，积累笔记十余册，总名为《读曲札记》，涉及“上千种古典戏曲”<sup>②</sup>，每种都写有解题，但至今也未有该书出版的消息。

孙楷第还著有《元佚曲故事考》一书，“立足于考证出这些佚曲的故事来源与情节梗概”<sup>③</sup>。可以想见，这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。

即便是已经出版的《元曲家考略》一书，其底稿收录元代曲家十八人，大部分至今仍是未刊稿。

此外，孙楷第还“从诸家传记、图书志、地方志，抄出明、清曲家事迹数百条”，“自1932年至1935年间，校《元曲选》四五遍”<sup>④</sup>。

以孙楷第治学态度之严谨，学术功力之深厚，以其以往所著学术著作之精良，可以想象这些未曾刊布的著作也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，即使是在今天都不显得过时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中文系

---

①杨镰：《孙楷第传略》，载《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》第十一辑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43—44页。本文对孙楷第遗著的介绍主要参考该文及《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——孙楷第》一文。

②杨镰：《孙楷第传略》，载《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》第十一辑，第41页。

③杨镰：《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》，载王瑶主编：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》第359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。

④孙楷第：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，载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，第25页。